



□ 王一帆

《汜胜之书》中的术与道

在汉武帝广辟田亩、大兴农事之际，我国古代杰出的农学家汜胜之兴神农之教、继陶朱之风，“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他在指导关中农业生产实践的同时积累了丰富的农学经验，对当时流行的“粪种法”“渡种法”等种田方法进行了改良，创新了“区田法”，使关中地区获得丰产，保障了当时汉帝国都城的粮食供应。汜胜之的思想成果纠集于《汜胜之书》中，标志着精耕细作的农学思想新发展，并为《齐民要术》等后世农书广为征引。然而《汜胜之书》原书在流传中遗失，当今版本乃是根据《齐民要术》所引条文辑录而成。《汜胜之书》现存18篇，囊括了禾、黍、麦、稻、稗、大豆、小豆、臬、麻、瓜等13种农作物的栽培技术，提出了“趣时、和土、务粪、泽、早耨、早获”六条紧密关联的农业生产原则，其中既包蕴着天人合一等中国传统农业思想和哲学基因，又体现着鲜明的资政重本取向，乃是“术”与“道”的统一体。

“汜胜之术”：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

精耕细作是在集约用地情况下所采用的一套整地、选种、施肥以及田间管理的综合技术方案，其优势在于以增强劳动投入改善自然环境、提升生产效率，同时达成农田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技术模式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的沟洫农业，在秦汉时期的北方地区关中平原得到了长足发展。《汜胜之书》涵盖了汉代精耕细作农业的诸多标志性技术成就，提出了渡种法、点种法、区田法等生产方法。郑玄称汜胜之的贡献在于“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汜胜之术也”。所谓“土化之法”，即是改良土壤、增加农产的方法，而改良土壤的前提，则是对土壤强弱、肥瘦、厚薄等性质有充分的了解和区分。汜胜之善于观察土壤的状态，判断改良不同土壤的时机。如春天气气通达，则是耕硬地黑垆土的时节，此时多次耕地，以磨平泥块、将土和匀，这就是“强土弱之”法。相应地，在杏花繁盛时则应耕弱土，通过辊压、牛羊踩踏等方法使土质坚实，就是“弱土而强之”法。通过调节土壤结构，农田得以保

存空气、留存水养，提供有利于作物根系的良好条件。

“渡种法”是汜胜之在“粪种法”基础上用以改良土壤的重要方法。他认为“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田也”，在13种作物栽培中，汜胜之一一列出采用针对性的粪肥配方。关于“渡种”，书中亦列有详细的处理过程：“又取马骨铄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渍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蚕矢、羊矢各等分，挠，令洞洞如稠粥……至可种时，以余汁漫而种之，则禾稼不蝗虫。”“无马骨，亦可用雪汁。雪汁者，五谷之精也，使稼耐旱。常以冬藏雪汁，器盛，埋于地中。治种如此，则收常倍。”现代农学家分析指出，马骨、蚕粪和羊粪有利于为禾苗增肥，而剧毒的附子则可以杀灭细菌、防治害虫。雪水相比普通雨水，重水含量少75%，因此更有助于植物生长。

汜胜之发明的“区田法”，则在我国古代农业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区田法”假托伊尹“救民粪种，负水浇稼”之事迹，在三辅地区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区推广，据汜胜之所言，可达“十亩收千石”的丰产效果。尽管这一产量估计存在争议，但其中的先进性至今依然为农学家推崇。实施区田法，首先需要精细整理土地，预先规划农田的数目、面积、功能分区及挖土深度，同时按田亩方寸分配不同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务求“庶尽地利”。再者，种植区田需要合理播种，疏密有度，按照不同种类作物安排植株区间，以满足各种庄稼通风和光照的需求。同时，“区田法”需要配合精确施肥、适量灌溉、适时田间管理等农作技术。整体而言，“区田法”的农业生产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利用单户家庭内的劳动力存量，具有高产的前景。尽管相较于当时正在普及的铁犁牛耕并不具有太大优势，但合理利用天时地利配以人和的农业思想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汜胜之道”：天地人统一的农业哲学思想

在中国传统“三才论”基础上生发出的天地人统一的农业哲学思想，指导着精耕细作农业的运作。而这一模式获得农业丰产的秘诀，则是本着天（农业生产的气候条件）、地（农业生产的土地条件）、人（农业生产主体）三才统一的整体观，使人的活动与天时相协、与地利相调，从而改善作物的生长环境。正像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所总结，中国传统科技体系的背后，是一套有机主义的自然观。从《夏小正》开“三才统一”的先河，到《礼记·月令》《吕氏春秋》描绘“天一地一人”的宇宙图式，“三才论”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业，不仅重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物质循环，而且摆正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汜胜之书》取得的思想成就，离不开天地人统一的农业哲学基础。

汜胜之在《耕田》篇中贯彻了顺应天地的精神。他说：“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耨早获。”其中居于前两位的“趣时”与“和土”便为天与地的条件，而其余的“务粪”“泽”“早耨”“早获”则是人利用改造环境做出的努力。这六项原则相互配合，才能为农作物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论及耕田时机选择，汜胜之时刻注意人的农作活动是否与天、地相应，即便土地瘠薄，只要注意天地人的和谐统一，也能达到高产丰收的目的。判断春耕、夏耕和秋耕的时节，需要根据天气与地气的变化，以便掌握土地温度、湿度等状态。如“春冻解，地气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气始暑，阴气始盛，土复解。夏至后九十日，昼夜分，天地气和”，此时耕田，就可事半功倍。同样，在农历五月和六月耕种麦田则可“一当三”、“一当再”，而七月再耕则误农时，效果亦“五不当一”。

在天地自然的约束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农业环境，是《汜胜之书》的中心内容。根据不同作物的习性，汜胜之遴选出合适的种植方法与时机，务求每种作物各得其时，得到天地滋养。他为作物争取合适的天时，认为九谷种植皆有忌日，“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林忌寅未，小麦忌戌，大麦忌子，大豆忌申卯”，忌日的天时地气与作物本性相冲突，若强行种植则收成微薄。种黍需要“先夏至二十日，此时时有雨，强土可种黍”，种麦则是“得时雨不善。夏至后七十日，可种宿麦”，种稻需“春冻解，耕反其土”，种禾需“三月榆莢时有雨，高地强土可种禾”等等。这些是综合季节、物候、雨水、

土质等各种因素确定的经验总结，其中天的因素包括“榆莢时”等物候、“夏至”等节气、“有雨”等天气，地的因素则包括“春冻解”、“高地”、“强土”等等。农民的任务就是顺应天时地利，挑选合适的植株，创造作物茁壮生长的自然条件。

《汜胜之书》中的“治国之道”：资政重本的思想取向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生产在国家全局中的突出地位不言而喻，因而古代农学家的思想都带有明显的实践指向。我国农史专家石声汉曾言，“以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者，作为国防上人力物力的来源，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农本思想’”，此言精准概括农业思想家资政重本的共性，《汜胜之书》亦无出其外。虽然现存的《汜胜之书》仅为残本，但从其成书背景、书中具体的种植术到书后杂项，无一不渗透着汜胜之对农事与国政紧密联系的认识。汜胜之关于农业生产地位的更多思考已不得而知，但其保障粮食安全的思想，则在《汜胜之书》中尤为突出。

早在战国时代，农家已经意识到农业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如《吕氏春秋·上农》中开篇即言“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且将农业生产与社会道德和秩序联系起来，主张通过重农达到“边境安，主位尊”、“公立法，力专一”的统治效果。汜胜之认为“谷帛实天下之命”，一语言中农业生产在国家运转中的关键地位。《汜胜之书·杂项》中提到“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言明粮食问题事关国家存亡；同时，称赞“卫尉前上蚕法”和“今上农事”乃是“忠国忧民”的做法，亦暗示自己写作此书的目的。

汜胜之资政重本的思想取向，与当时西汉拓土战争下的社会状况存在深刻联系。武帝朝长达50余年的对外战争带来了国内深重的粮荒与财政危机，据《史记·平准书》记载，“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同时，汉武帝时代灾荒频发，据历史学家整理，西汉共历11次大型水旱灾害，武帝朝占4次，频繁的自然灾害直接降低农业产量，影响战争局势。财政危机与自然灾害严重威胁着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同时战时体制下关中作为汉帝国核心区域的稳定需要，又突出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汜胜之的“督三辅种麦”，正发挥着辅“天下之命”的作用。

《汜胜之书》将维护粮食安全当作重要任务，围绕关中地区粮食生产保障问题提出了三方面解决措施：精耕细作以增加产量，作物种类多元化以备荒年，发展漕运以保障粮食供应。区田法作为汜胜之的主要发明，增加施肥、灌溉和田间管理，动员单户家庭的男女劳动力等方法提高农田单位产量。同时，《汜胜之书》中所收录的13种作物中，有不少是为备荒所种，例如稗子“既堪水旱，种无不熟之时……良田亩得二三十斛，宜种之备凶年”，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备凶年也。谨计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田之本也”。此外，汜胜之引用吴王夫差开邗沟之例，暗示漕运亦为保障地区粮食安全的方法。氍子河决后，汉武帝采纳大司农郑当时所言“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而益肥关中之地”，开凿黄河漕运，使关中地区粮食供应又添一重保障。

《汜胜之书》提出了一套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总结了10余种农作物的栽培技术，是当时劳动人民的实践智慧与劳动成果的结晶，其中的某些农业技术至今依然具有参考意义和实用价值。《汜胜之书》是中国古代传统农学天地人统一思想的具体运用，是中国古代“三才论”哲学观点的衍化成果，继承和丰富了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既发展了天人和谐的中国传统自然观，亦充分肯定了人作为生产主体的积极作用。《汜胜之书》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和备灾备荒的忧患意识，为适应汉武帝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薛文周为何被称为“天下廉吏第一”

□ 王志强

说起“天下第一廉吏”，绝大部分人都会想起康熙时期的于成龙。然而在明代万历时期，万历皇帝也御赐过“天下廉吏第一”的名号给一个官员，这个人就是薛文周。

薛文周，陕西安定（今子长市）人。薛文周虽然在正史中名声不显，做的官也不是很大，但他的一生以“清廉”二字贯穿始终，辗转多职不改自己的廉洁本色。据清道光时期的《安定县志》记载，薛文周自幼便有整顿天下风气之志，把海瑞视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当地的县令非常欣赏他，觉得他是一个读书的好苗子，便让他跟在自己身边学习，以便于时常指导他的学业。就这样，薛文周的学问大有长进，二十几岁，便考中了进士。

薛文周被任命的第一个职位是山东潍县（今潍坊市）县令。薛文周到任后，以读书时的理想为指导，根据现实情况和百姓需要来制定施政政策，因此他的政策措施贴合民生，受到百姓的交口称赞。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百姓们争先恐后把自己家的特产送给薛文周，薛文周一介不取，并告诉百姓们自己只是做了一个地方官应该做的事情。清乾隆时期的《潍县志》说薛文周在潍县的优异表现，被当时的山东布政司看在眼里，等到了考核地方官员时，薛文周的考核成绩被评为山东的第一名。

山东布政司认为潍县的政事已经步上正轨，便将薛文周调往当时号称难治的掖县（今莱州市）担任县令。薛文周不因为自己被评为第一就骄傲自满，到了掖县，他依然保持着勤勉政事、廉洁守节的品质。清乾隆时期的《掖县志》以浓墨重彩的笔记记录了薛文周在掖县的政绩：上任后，薛文周实地调查百姓的苦与痛，考察历任施政者的得与失。他发现当地的胥吏在面对百姓时耀武扬威，面对官员时阿谀奉承，前几任县令为了省事，对此听之任之。薛文周则对此作出了大胆的改革，他让百姓直接把投诉书

（上接1版）城市更新是群众身边的民心工程，居民群众对“改什么”“怎么改”最有发言权。依托网络开门纳谏、集思广益，把民众心愿落实到更新改造现场，往往能收获事半功倍的效果。作为全国首批城市更新试点城市，南京深入实施有温度的城市更新，推动共商共建共享。注重引导居民与共享规划师、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城市更新的方案设计，采取“小尺度、渐进式”的微更新模式，实现历史文化保护、城市功能提升、居民生活改善的有机统一。二是在经济复苏中纾民困、暖民心。做好经济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注重在经济发展中保障民生，照顾特殊群体诉求，培育包容性发展环境。小微企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牵着就业民生，是实体经济的“肌体细胞”，特别是街头巷尾那些不起眼的小店，既是城市“烟火气”的支撑，更关系千万家庭，事关群众生计。

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不仅要有立场、有感情、有温度，还需要有章法、有艺术、有力度。进一步厚植为民情怀，牢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在网络沟通中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始终同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把党群干群的情感纽带系得更加紧密。牢固树立实干导向，从网民最关心、反映最集中、群众最迫切的问题入手，既办好百姓牵肠挂肚的民生大事，也办好市民天天有感的身边小事，切实把群众和企业的操心事、烦心事办成惠企便民的暖心事、贴心事。扎紧网上群众工作闭环，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最高标准，以刚性机制和管用举措，真正把党的各项惠民政策落到位、做到位。

交给自己，不需经过胥吏之手。这样虽然加大了薛文周的工作量，但却减少了胥吏上下其手的机会，让他能够更加直接地联系和接触百姓，了解百姓的心理。在断案方面，他继承了子路“片言可以折狱”的精神，以公正严明的断案态度，获得了审理双方的认可。

薛文周的清名传遍了掖县四周，百姓们以有这样的县令而自豪，而豪强匪寇的气息也为之收敛。当时的风气为之一清。掖县周围驻扎着莱州的部队，士兵暴虐躁动，经常骚扰百姓，并勒索地方官吏输送粮食，稍有不顺，就以兵变来恐吓。薛文周为了平息士兵的嚣张气焰，单马入营，正气凛然地呵斥士兵的不法行为，指出他们行为的不当之处。士兵们早就听闻过薛文周的清名，又看到他孤身一人就敢于闯营，心中佩服不已，躁动的军营也因此得到了安抚。

平定这些乱事之后，薛文周又开始整治赋税。薛文周对历任掖县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每每缴纳过多赋税的行为不以为然，他多次上疏上司，指出掖县历经多次灾害，缴纳不起正常赋税以外的税收。布政司收到汇报后，派人下来实地考察，发现薛文周所言不虚，就减少了掖县的赋税。仅此一项，就让掖县百姓舒缓了一大口气，救活了不少百姓。

在掖县的五年间，薛文周没有拿过百姓的任何好处，每天过着水浆拌饭的清淡生活，他曾对友人说：我薛文周没有什么特别的优点，惟有在一介不取这一方面，我无愧于心。当初上任时，别人都是拖家带口，薛文周只带了一个老仆，两人每天固定的伙食是两升米，有多余的粮食都分给掖县的孤寡老弱。薛文周住处的大门经常不关门，他跟别人说道：我子然一

身，身边只有一方县印、几卷诗书，又有什么必要关门呢？到了冬天，薛文周缺少棉袄，冻得瑟瑟发抖，当地致仕归家的赵焕得知后，特意给他送去一件质量上乘的棉衣，薛文周对赵焕说：我立志不拿掖县百姓的东西，你送东西给我，是看不起我的志向吗？坚决拒绝了赵焕的好意。

任职期限到了以后，薛文周接到了升迁的调令，掖县百姓扶老携幼，攀援薛文周的马车，不让他走，当时的哭声震天，大家都不舍得薛文周离开掖县。无奈的薛文周只好停下马车，一眼跟大家道别，并跟百姓述说王法的重要性，告诫他们要尊重王法、尊重朝廷的命令。在薛文周离开后，当地的百姓家家都刻有薛文周的雕像，每当遇到重要事情的时候，就会向其祷告，祈求薛文周的保佑。

在京述职期间，万历皇帝特意召见薛文周，听到周围的大臣讲述薛文周的事迹后，万历皇帝大为感动，特赐“天下廉吏第一”六字给薛文周。并举办御宴，向百官介绍薛文周的清廉事迹，鼓励大家向薛文周学习。后薛文周被授予吏科给事中一职，负责纠察百官的不法行为。在任期间，薛文周弹劾官员不避权贵，举荐官员不放弃贫寒士子，深得百官的敬爱。

据清雍正时期的《安定县志》记载，薛文周逝于吏科给事中的任上，去世时，身边的行李只有几封奏议，以及十两俸禄，除此以外，别无他物。当地百姓为他立了一块牌坊，名为“廉垣坊”，并将其置入乡贤祠。清代道光时期安定的乡贤祠只祭祀了两个人，其中之一便是薛文周，可见安定百姓对于薛文周的敬重。



坚信“网”聚人心、“智”惠于民的制度力量，聚力打造城市治理升级版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强调要“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网络舆情中能发现治理的难点，网上留言中能看到治理的盲点，网民建议中更能找到治理优化的起点。坚持把走好网上群众路线作为推进特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抓手，把平台数据价值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在触网用网中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基层治理精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一是弘扬网络空间“正能量”。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随着互联网的社会动员功能日益增强，必须积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坚持正面宣传为主，让正能量充分涌流。我们一方面注重外形形象，打造“极美南京”等特色品牌；另一方面坚持内聚人心，让“有归属感的城市”成为全体市民的共同价值追求。二是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比如，坚持党建引领，聚焦为民服务，加快完善到底到边、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体系。深入推进“精网微格”工程，把社区治理落到每个楼栋、每户家庭。三是建好智慧政务“连心桥”。构建全流程一体

化在线服务平台，更好解决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的问题，是让群众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的重要方面。这需要着力打造泛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智慧政务体系，深化“一网通办”改革，实行“一张清单”亮事项、“一个池子”聚数据、“一套系统”做政务、“一个空间”汇证照，不断提升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四是欢迎网络监督“啄木鸟”。网络是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网上的每一条群众诉求和建议，既是社情民意的直观表达，也是网络监督的重要体现。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通过微访谈、定向约稿、聘任观察员等方式开渠引流，支持专家学者发表真知灼见，在共商共议中凝聚起解决问题的合力。

网络空间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的重要支撑。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结合，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网上宣传理念、内容、形式、手段创新，更好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二十大精神团结凝聚广大网民。坚持“党员党语”与“网言网语”相结合，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开来，用身边人身边事讲好新时代发生在南京的中国故事。坚持“强基固本”与“数字赋能”相结合，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对网络安全的保障能力，推动数字技术在城市治理、公共服务、应急管理等领域深度应用，持续拓展数字化惠民成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作者系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